

再论中国的粟特柘羯军^①

王 睿

内容提要：针对法国学者魏义天文中出现的几个问题，从“柘羯”“拓设”和“柘折”的词义考辨入手，逐步引出与之紧密相连的突粟共生环境、突厥系粟特人诸问题。以此为背景，对柘羯募兵制中的“募”字在不同时空环境中的运作方式进行考察，尤其对安禄山积宝募兵的综合方法做了个案分析。最后又回到粟特人的商业本性上，结合王国维的上下二级观来探讨粟特人商武二元分离的心理。研究结果表明《通典·突厥上》中的“柘羯”并非指粟特精兵，而是特指东突厥阿史那社尔；中亚石国古名“柘折”音义与柘羯全无关涉。中亚柘羯实为粟特诸国出钱招募的精英战士，其兵源主要以游牧种粟特人为主。在突粟共生环境影响下，唐帝国内部的柘羯成为突厥系粟特武人以及胡蕃联军的代称。安禄山通过商业、礼俗、宗教、政治等手段来笼络贾胡，招募胡蕃将士为其服务。九姓胡重利轻政的心理和商武二元分立意识，实源自粟特地区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

关键词：粟特人 柘羯 募兵制 阿史那社尔 安禄山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1）03—0014—12

2004年，法国魏义天先生在北京召开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国际研讨会上，提交了一篇名为《中国的粟特柘羯军》的论文，^②将中外史家早已论及的“柘羯”问题再次提出。^③大体而言，柘羯是一支由中亚昭武九姓胡组成的粟特精兵。^④这几乎已成定论，本难再有新的创获。但魏先生独辟蹊径，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切入，在论完河中及交界地区的柘羯侍卫现象之后，又结合中国史籍，对唐帝国内部不同地区的柘羯情况做了梳理。^⑤但遗憾的是，

- ① 本文为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朝隋唐粟特人华化礼俗研究”（批准号：10CZS011）成果之一。
- ② 〔法〕魏义天著；阿米娜译《中国的粟特柘羯军》，见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法国汉学》第十辑，中华书局，2005年，第235~240页。
- ③ 〔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27页注四。〔日〕藤田丰八著；杨炼译《西域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72、173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13~214页。谭其骧《羯考》，原载《益世报》1947年1月9日《历史与传说》第一期，后收入作者《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4~233页。Edwin G. Pulleyblank, *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T'oung Pao, Vol. 41, 1952, p. 347-354. 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卷十一“突厥本传校注”，中华书局，1958年，第539页。张星娘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296页。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第114、115页。〔日〕森部丰著；温晋根译《唐后期至五代的粟特武人》，《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226~234页。
- ④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114页。
- ⑤ 〔法〕魏义天著；阿米娜译《中国的粟特柘羯军》，《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235~240页。

魏先生的结论存在一些错漏: 1. 所引《通典·突厥上》中的“柘羯”, 并非粟特精兵的代称, 而是特指东突厥阿史那社尔; 2. 所引《新唐书》中的两处“柘羯”, 极有可能是安禄山麾下的胡蕃联军, 而无法肯定其就是粟特人; 3. 魏先生注意到了商业—军事背景在安史之乱中所起的作用, 却未能从柘羯募兵制的角度进行阐释。究其致误之由, 一是未能全面掌握前人研究成果, 也没利用更可靠的汉文史籍进行校勘, 以致承袭错讹而未觉; 二是对“柘羯”的理解过于简单, 未能从动态变异角度审视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柘羯”词义内涵的变化。有鉴于此, 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 对汉文史料中的柘羯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同时提出一些自己的心得和看法。

一、粟特“柘羯”与突厥“拓设”

《通典·突厥上》记云:

……颉利之败也, 其部落或走薛延陀, 或走西域, 而来降者甚众。酋豪首领至者皆拜将军, 布列朝廷, 五品以上百余人, 殆与朝士相半, 惟柘羯不至。^①

魏先生认为, 招降不至的“柘羯”, 实际上是颉利可汗身边的柘羯近卫军。但鉴于《周书·突厥传》和《新唐书·突厥传》早有突厥卫士“附离”之记载,^② 他只能依据《旧唐书·突厥上》里的材料另作解释“颉利每委任诸胡, 疏远族类, 胡人贪冒, 性多翻覆, 以故法令滋彰, 兵革岁动, 国人患之, 诸部携贰。”^③ 魏先生认为, 颉利可汗任用胡部引发了内部不满。考虑到自身安全, 他违背传统习惯, 在“附离”之外首设“柘羯”雇佣军。然而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曾经指出, 颉利内部的变乱应当和 630 年降服的伊吾城有密切关系。^④ 魏先生对此予以反驳, 并指出散落在伊吾的柘羯, 可能是帮助突厥可汗控制该地区的粟特人。如果史料确凿的话, 魏先生的推论的确出彩。但载有同条史料的《册府元龟》却清楚地表明,《通典》中的“柘羯”并非粟特柘羯军, 而是特指东突厥处罗可汗的次子阿史那社尔。^⑤ 其实, 上引《通典》中材料已经告诉我们, “柘羯”是与“酋豪首领”并列朝廷的头领之名, 而这项权利恐非普通柘羯将士所能享受。

《册府元龟·将帅部》的记载表明《通典》中的“柘羯”实为“拓设”之讹。

初, 颉利之败也, 其酋豪首领至者皆拜将军, 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 殆与朝士相半。唯大度设、拓设、泥熟特勒(勒当作勤)不至。^⑥

何以如此肯定呢?“柘羯”之义的词在汉籍中都有多种写法, 依成书先后分别为《大唐西域记》

① (唐) 杜佑撰; 王文锦, 王兴, 刘俊文等点校 《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 中华书局, 1988 年, 第 5413 页。

②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周书》卷五〇《突厥传》: “侍卫之士, 谓之附离, 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 志不忘旧。”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616 页。〔宋〕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上》: “突厥阿史那氏, 盖古匈奴北部也。……卫士曰附离。”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4590 页。

③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上》,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3509 页。

④ Pulleyblank, *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pp. 347–354.

⑤ 吴玉贵先生早就明确指出“拓设”即阿史那社尔。参见氏著 《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第 209 页。并在他新出的《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上册, 中华书局, 2009 年, 第 43 页) 中作了校勘。惜未能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以致错讹相传, 甚至流播海外。

⑥ (宋) 王钦若等编 《册府元龟》卷四〇七《将帅部》“谏诤”, 凤凰出版社, 2006 年, 第 4619 页。

作“赭羯”，^①《通典》作“柘羯”，《唐会要》作“拓跋”，^②《册府元龟》作“拓设”，《新唐书》作“拓羯”，^③诸词形近难辨，极易导致词义曲解；不论从成书时间——《通典》成书于唐贞元十七年（801年），《册府元龟》成于北宋祥符六年（1013年）；还是史料价值——二书皆以唐事记载的详尽、准确而闻名，只是《通典》侧重典章制度，《册府元龟》偏于唐代史事。二相比较，《通典》还略胜一筹。但关键在于，与《通典》“惟柘羯不至”寥寥数字相比，《册府元龟》提供了更重要的历史信息，而这些信息都能够求证得实。由于《通典》缺少“大度设”和“泥熟特勤”这两个关键信息，“拓设”一词遂显得孤零难证，而此时突然想到颉利可汗与粟特胡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于是未经考校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考虑到《新唐书·突厥传》中有“(突厥)别部典兵者曰设”^④的记载，笔者认为某些涉及突厥的“柘羯”和“拓跋”都是“拓设”之讹。在突厥军制中，“设”是部落最高级别的统帅职称。《贞观政要集校》收录了唐太宗与突厥使人的对话：

太宗问拓设使人曰“拓设兵马今有几许？”对曰“见(现)有四千余人，旧有四万余人。”^⑤

材料不但确认了“设”的统兵职能，更能从中推见突厥极盛时的兵员规模。按“设”这一官职，本创于突厥初兴之际。西魏废帝元年（552年），土门大败蠕蠕之后，自号为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为叶护、特勤，别部领兵者为设，其他官阶依次为（乙斤）屈律啜、阿波、颉（俟）利发、吐屯和俟斤。^⑥此外，“设”尚有“察”、“杀”等异译，而在人选上坚持“系谱”和“血统”两大原则。该职务在和平时是行政长官，在战争年代则为军事统帅。^⑦既然“设”在突厥帝国中的地位如此之高，它就不可能轻易授予外邦之人。《通典·突厥上》记录了一条重要材料。“（阿史那）思摩者，颉利族人。始毕、处罗以其貌似胡人，不类突厥，疑非阿史那族类，故历处罗、颉利代，常为夹毕特勤，终不典兵为设。”^⑧因疑阿史那思摩非突厥族，始终未授予他“设”的称号。由此可见，突厥人对军权的掌握极为慎重，如非皇家亲贵，决不轻易授人。这也反证了身任“拓设”的阿史那社尔绝非粟特人之“柘羯”。此义既明，复取史籍加以确证。《资治通鉴·唐纪》：

阿史那社尔，处罗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闻。可汗以为拓设，建牙于碛北，与欲谷设分统敕勒诸部。^⑨

处罗可汗曾亲授“拓设”一职给阿史那社尔。但同页胡三省注云“突厥谓子弟典兵者为设。与社尔同时典兵者非一人，故曰诸设。”据统计，突厥第一汗国（552～630年）时期，号称“设”

①（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颉利建国》卷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87～88页。

②（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中华书局，1955年，第1311页。

③《新唐书》卷一三五《封常清传》，第3601页；卷一九二《张巡传》，第4260页。

④《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上》，第4590页。

⑤（唐）吴兢著；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一，中华书局2003年，第44页。

⑥《通典》卷一九七《边防·突厥上》，第5402页；《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下》，第3523页。

⑦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116～117页。

⑧《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十三·突厥上》，第5415页。

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十”，中华书局，1956年，第6117～6118页。

者十六人，出身阿史那氏的就有十二人。^① 那么“拓设”会不会是其他某“设”而与阿史那社尔无关呢？《旧唐书·张公谨传》记载了张公谨所述六条可攻取突厥的理由，其中第三条为：

突利被疑，轻骑自免；拓设出讨，匹马不归；欲谷丧师，立足无地；此则兵挫将败，其可取三也。^②

材料所陈史实，当指贞观元年（627年），铁勒、回纥、薛延陀发动叛乱，于马鬣山击败欲谷，阿史那社尔出兵相助却遭落败之事。^③ 其中提到的突利和欲谷，一为始毕可汗之子，一为颉利可汗之兄子（《新唐书》作颉利之子），皆为可汗亲贵子弟。无论从身份还是史迹，都只有处罗可汗次子阿史那社尔一人可堪符契。

此桩公案既了，始可对魏义天先生的观点进行评判。他认为《通典·边防典》中所记载的伊吾“商胡胜兵”，乃是粟特人在突厥帝国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颉利可汗为控制伊吾而雇佣的粟特柘羯军。诚然，6世纪中期突厥势力侵入中亚索格底亚那以后，突、粟关系日益加深，粟特人凭借其超强的商贸能力和发达的文化宗教，全面渗透于突厥汗国的各个领域，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突粟共生环境。^④ 但经过前文辨证，我们知道散落在伊吾的并不是粟特柘羯军，而是阿史那社尔，他之所以没来归唐，主要是为了报薛延陀的破国之仇。《旧唐书·阿史那社尔传》称：

首为背叛破我国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据有西方，大得兵马，不平延陀而取安乐，是忘先可汗，为不孝也。若天令不捷，死亦无恨。^⑤

后来阿史那社尔终于归附，乃是因为兵士厌战，大半逃亡，兵微将寡的社尔再次败于薛延陀之手，唯剩归降一途；加之阿史那社尔先前曾用计诈夺西突厥的半壁江山，已与西突厥结下怨仇，深隙难弥，故权衡再三，终于贞观九年（635年）率众归唐。^⑥

二、石国“柘折”音义和中亚柘羯募兵制

确而言之，“柘羯”系指中亚康、安、史国招募的粟特精兵。《大唐西域记》提到飒秣建国（康国）“兵马强盛，多诸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⑦ 《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安国）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⑧ 《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公元740年，史国柘羯王斯谨鞬因平苏禄可汗有功而加特进。^⑨ 三国分指今中亚两河流域的撒马尔干（Samarkand）、布哈拉（Bukhara）和佉沙（Kesh，阿拉伯/波斯语对音为Kassā）地区。康、安两国分别是东粟特和西粟特的中心，均系中亚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城市。至于史国，其

① [日] 护雅夫《古代突厥史研究甲编》（古代トルコ民族研究，I），东京：山川出版社，1967年，第334～335页。

② 《旧唐书》卷六八《张公谨传》，第1691页。

③ 《新唐书》卷一〇《阿史那社尔》，第3281页。

④ Vaissière, Étienne de la,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pp. 208–210.

⑤ 《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社尔传》，第2230页。

⑥ 《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社尔传》，第2230页。

⑦ 《大唐西域记校注·飒秣建国》，第87～88页。

⑧ 《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下》，第4738页。

⑨ 《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册封第二”，第11175页。

故城位于撒马尔干以南 75 公里处的沙赫里夏勃兹 (Shahrisabz), 也同样被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库比 (Ya'qūbī) 视作粟特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作为粟特语的同义汉译, “赭羯”、“柘羯”都有“战士”或“卫士”的意思。^① 目前虽未发现确切的粟特语对音, 但周边民族语言中均有相同意义的词汇, 比如波斯语 chāka^②、土耳其语或突厥语 sagas^③ 以及阿拉伯语 Šakiryyah。^④

此处须对石国国名“柘折”音义稍作辨析。陈寅恪先生曾据前引康、安两国以及“石, 或曰柘支, 曰柘折, 曰赭时”^⑤ 的材料, 推出“凡康安石等中亚月氏种人, 皆以勇健善战著闻者也”^⑥ 的结论。实际上石国 (今中亚塔什干, Tashkent) 国名与柘羯并无关系。陈先生误将“柘支/柘折/赭时”等同于“柘羯/赭羯”, 实属智者千虑一失。对于“石国”名称之音义, 国内外已有众多学者论及,^⑦ 其中以季羨林先生的概括最为凝练:^⑧

粟特语作 C'c, 见粟特语《国名表》。[痕宁《粟特语杂考》, 伦敦, 1940 年, 页 8

《国名表》(b) 栏第 (6): C'cn'y; 痕宁在页 9 释义: “Čac, Čaš, Šaš 之民众”] 波斯语作 Chach 或 Jaj; 阿拉伯语作 Shash, Šaš 语义为“石”。

现将音、形最为相似的“柘羯”和“柘折”的外文对音排比如下, 即可发现其中的异同之处。

波斯文: chāka (柘羯)

Chach (柘折)

阿拉伯文: ākiryyah (柘羯)

Shash (柘折)

粟特文: c'δr - k'r^⑨

C'c (柘折)

“柘”与“c/ch/sh”对应, c/s 符合音变规则, 实无差别。但“羯”字语尾“ka/kir/k'r”与“折”字的“c/ch/sh”的音、形完全不同, 显然是两个意思。加之石国义为“石头”, 与“柘羯”(战士)无必然联系。由此可以断言, 石国与柘羯, 一为国名, 一为军士职名, 二者互不相干。以上仅从音义方面排除“石国”与柘羯的联系, 却不代表石国没有柘羯。史言石国“多良马”, “其俗善战”。^⑩ 记载虽始见于隋代, 然自汉至唐, 其风物、语言, 应无大的变动。唐人所记柘羯称号者, 仅康、安、史三国, 但实际上被施号的, 必不限于此三国。《大唐西域记》曾言康国为诸国之中心, “进止威仪, 近远取则。”^⑪ 既然其礼仪行为会被普遍效仿, 那么“柘羯”

① 沙畹指出, 此名在康居 (Sogdiane) 一带训作卫士 (garde du corps), 见《西突厥史料》, 第 127 页注四。

② 蒲立本记云, 该词系沙畹从马迦特 (Marquart) 处获知。Pulleyblank, 1952, p. 349, 魏义天先生从纳尔沙希 (Naršahi) 的《布哈拉史》中寻出波斯文“Čākirān”, 即布哈拉王的近侍。

③ 张星娘引用了堀谦德《解说西域记》的说法, 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 第 296 页。白鸟库吉之说原载《东洋学报》1 卷第 332 页, 转引自岑仲勉《突厥集史》(下), 第 539 页。

④ [法] 魏义天《中国的粟特柘羯军》, 《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 第 235、236 页。

⑤ 《新唐书》卷二二一《康国传》, 第 4739 页。

⑥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第 214 页。

⑦ 以上分见沙畹《西突厥史料》, 第 131 ~ 132 页。冯承钧原编; 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Tashkend”条, 中华书局, 1982 年, 第 93 页。张星娘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4 册), 第 77 ~ 78 页。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 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 1 卷, 民族出版社, 2002 年, 第 489 页。

⑧ 《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赭时国》, 第 83 页。

⑨ 伊利亚·雅库波维奇 (Ilya Yakubovich) 曾提供给魏义天一条重要的词源信息: 在粟特文中, c'δr - k'r 义为“从属的”, 前缀 c'δr 表示“在……之下”; 后缀 k'r 为社会团体的附加成分。此外, c'δr 还有缩写成 c'的其他例子。见魏义天《中国的粟特柘羯军》, 第 236 页。此说虽未确, 但可作为一项重要参考。

⑩ 《隋书》卷八三《石国传》,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1241 页。

⑪ 《大唐西域记校注·飒秣建国》, 第 87 ~ 88 页。

的招募也在情理之中。“大抵自葱岭以西，至于咸海，北起亚历山大，南抵兴都库什山，即隋唐时代所谓昭武九姓诸国之地，风土大同，种族毋殊，皆柘羯桑梓之邦也。”^① 谭其骧先生半个多世纪前的论断，至今余音犹响。

在追溯“柘羯”中亚语源的过程中，笔者尤其注意到《新唐书·西域传》中“(安国)募勇健者为柘羯”中“募”字的涵义。“募”即“招募”，是募兵制的专用术语。它与征兵制不同，前者是国家拿钱的雇佣兵役制度，后者是农牧民自己出钱的义务兵役制度。募兵制的实施需满足几个条件：1. 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支撑起整个军团的械马装备和供需给养；2. 本国缺乏征战人才，须从外部引进；3. 兵农合一制遭到破坏，无法延续，只能通过募兵来维系军力。唐朝的府兵制和突厥的兵民合一制，均属于义务兵役制范畴，平时从事农、牧业生产，遇战事时即披挂上阵，奔赴战场。8世纪中期，碎叶川的数万异姓突厥兵“耕者皆擐甲”^②，即突厥兵民合一的典型例证。

粟特人素以经商闻名于世。中国史籍记载“有城郭之居，务殖货之利”^③，“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④；亚美尼亚地理学家、希拉克的亚拿尼亚也说“粟特人都是富裕、勤劳的商人，他们居住在突厥斯坦和阿里亚之间。”^⑤但在商业拓展以前，粟特人主要以人工灌溉农业为主。^⑥汉代以后，本土商人才逐渐冲破大夏商人和帕提亚商人的阻挠，从本土向周边区域发展，至隋唐而一跃成为丝路霸主，并获得“商业帝国”^⑦的伟称。当然，粟特本土并未抛弃农业，而是把农业和商业相结合，即史籍所说的“力田逐利者杂半矣”^⑧。粟特人积极融入地区和国际贸易活动，财力雄厚，每遇战事，即以优厚报酬雇佣柘羯为其效力。

就招募对象而言，通常是以“勇健”与否作为衡量标准。^⑨芮传明先生根据玄奘所述窆利人(粟特人)“志性恒怯”和“力田逐利者杂半”，^⑩指出正是由于粟特人主要从事商业和农业，以及生性恐惧，不具备战士素质，故其用于保国安民的军队(尤其是精锐部队)就只能从各外族——特别是游牧部族——中招募。^⑪此说颇有新意，但结论却稍嫌偏颇。以《通典》中伊吾粟特人为例：

(伊吾)至隋，有商胡杂居，胜兵千余人，附于铁勒，人甚骄悍，厥田良沃。隋末

① 谭其骧《长水集》(上)，第229页注。

② 《新唐书》卷二二下《康国传》，第4739页。

③ 《大唐西域记校注》“序论”，第43页。

④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康国”条，第1240页。

⑤ Ananias of Širak, *Geography (Ašxarhac'oyc')*: Hewsén, R. H. (intr., trans. And comm.), *The Geography of Ananias of Širak (AŠXARHAC'OYC')*. The Long and the Short Recensions, (Beihefte zum Tübinger Atlas des Vorderen Orients, Reihe B [Geisteswissenschaften], 77), Wiesbaden, 1992, p. 74A.

⑥ B. I. Marshak and N. N. Negmatov, *Sogdiana*, in B. A. Litvinsky, Zhang Guang-da and R. Shabani Samghabadi,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I: *The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s: A. D. 250 to 750*, UNESCO Publishing, 1996, pp. 233.

⑦ Vaissière, Étienne de la,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Part One and Part Two.

⑧ 《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窆利地区综述”，第72页。

⑨ 芮传明《“曳落河”与“柘羯”考》，《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

⑩ 《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窆利地区综述”，第72页。

⑪ 芮传明先生早在《“曳落河”与“柘羯”考》(《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中，就谈到这种募兵制，惜限于主题，未能详阐。

内属，置伊吾郡。属天下乱，又臣突厥。^①

商胡中可“胜兵”者就达千人，可见粟特人并非天生性怯。当然，玄奘所说的，乃是中亚粟特人，而与东迁汉地者无涉。但就中亚粟特人而言，也并不乏“猛烈”之士。《大唐西域记》就谈到康国“风俗猛烈”、“其王豪勇”、多柘羯、性勇烈等情况。^②对于这些豪勇之士的来源，笔者认为与本土游牧种粟特人有关。历史上，粟特地区曾先后被月氏、康居、嚙哒、突厥等游牧民族占领，因不习惯绿洲城邦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游牧者都会重返草原，但也有部分因驻守或其他原因因而留居下来。以康居为例，虽然该族主要活动于“肯特门丢别河谷，塔什干绿洲和费尔干纳西部”^③地区，但当国势强盛或受到外族（匈奴、嚙哒、柔然）迁徙浪潮冲击时，也会选择南下索格底亚那，以通婚杂居等形式逐步融入当地社会。^④隋唐时期的昭武九姓国，大部分是在汉晋时期康居所属诸小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⑤无论是在康居还是昭武九姓时期，康国（Samarqand）始终都以政治中心或宗主国的身份出现，故尔成为游牧人居留之首选。^⑥如此一来，有关康国风俗猛烈的记载就不难理解了。

三、石蕃共生与突厥系粟特人

谈到中国柘羯军，就不能不提它与突厥之间的特殊关系，并由此引出突粟共生环境的问题。^⑦从西突厥侵入中亚开始，突厥人就与柘羯结下不解之缘。前引《册府元龟》材料称史国国王斯谨鞬为“拓羯王”，而被封为石国王的莫贺咄吐屯却为“蕃王”。^⑧同为率军平叛的粟特军事首领，为何称呼却不同呢？原因在于斯谨鞬是地道的粟特国王，而莫贺咄吐屯却是突厥人派来监理石国的代王。实际上，中亚“柘羯”与“蕃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系指粟特精兵，后者则为北方突厥诸族的泛称。公元6世纪中后期，西突厥侵入索格底亚那，首先遇到的就是位于锡尔河以北的石国。《大唐西域记》记载：

赭时国周千余里，西临叶河，东西狭，南北长。土宜气序，同敝赤建国。城邑数

十，各别君长，都无总主，役属突厥。^⑨

“叶河”即今锡尔河，“敝赤建国”据前苏联学者考定为今塔什干地区的哈那巴德（Ханабад）。^⑩石国“役属突厥”始于隋朝末年。当时射匮可汗察觉到石国王石涅有异心，遂兴兵灭之，并令特勤旬职摄掌其国事。^⑪此后石国始终受到突厥的节制，不论是贞观十五年（641年）被挟入突

① 《通典》卷一九一《边防典》“西戎总序”，第5198页。

② 《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飒秣建国”，第87、88页。

③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Фр, 1984г, V1, стр. 167. 转引自纪宗安《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见氏著：《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中华书局，2008年，第191页。

④ 纪宗安《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第191页。

⑤ 陈海涛《康居与康国关系考——兼谈昭武诸国的起源》，《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⑥ 陈海涛《康居与康国关系考——兼谈昭武诸国的起源》，《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⑦ Vaissière, Étienne de la,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esp. Chap 7, pp. 199–210.

⑧ 《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册封第二”，第11174页。

⑨ 《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第82页。

⑩ А. М. Беленицкий,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город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Л, 1973г, стр. 198.

⑪ 《隋书》卷八三《石国传》，第1241页。

厥内部争斗的“石国吐屯”^①，永徽六年（655年）遣使进贡的“大石国、盐莫念”^②，显庆年间的“瞰土屯摄舍提於屈昭穆”^③，还是开元初年的“莫贺咄吐屯”^④，从职官——吐屯和名字判断，大多是负责监领石国的突厥人。^⑤石国既为突厥所监控，那柁羯必然也在战事征召之列，而在突厥兵制中，柁羯确属突厥的三军团之一。^⑥据杜环《经行记》记载，石国东边的碎叶川有“异姓部落”和“异姓突厥”，各有兵马数万。^⑦“异姓突厥”指葛逻禄；^⑧“异姓部落”则指昭武九姓粟特人。果尔，其数万兵马中，必然有粟特柁羯的身影。他们之所以出现在碎叶川，除与突厥共同执行军事任务之外，主要还是为了保障粟特商人的利益。碎叶川有大量为配合商队贸易而建立起来的中转站——粟特移民地。^⑨7世纪二三十年代，亲历中亚的唐代高僧玄奘，就曾“看到碎叶城以西的楚河流域、怛逻斯河流域分布着一连串的粟特移民城镇”^⑩。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深入考察中亚柁羯军的具体情况，但从以上论述来看，柁羯军与突厥蕃军是可以区分开的。然而一入唐境，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唐帝国境内的柁羯军，正如张星烺先生所言“此种兵既皆为招募之兵，各种人皆有。好勇好战，以争斗为职业者，皆可投之也。此等军队无种族界。”^⑪在突粟共生环境和“内亚化”^⑫影响下，“柁羯”词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原来以粟特柁羯为主、异族军团为辅的狭义词汇，逐渐转化为以异族军团为主、粟特武人为辅的广义词汇。这在安史之乱的兵源组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禄山度河，陷荥阳，入罍子谷，先驱至葵园。常清使骁骑拒之，杀柁羯数十百人。”^⑬封常清临终上表则称“昨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⑭至德二载（757年），安禄山死后，其子安庆绪遣部下攻睢阳“贼觐城上兵休，乃弛备。巡使南霁云等开门径抵子琦所，斩将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柁羯千骑麾帜乘城招巡。”^⑮句中“柁羯”皆为“柁羯”之讹。材料中的柁羯，并非纯粹的粟特人，而是糅入其他民族的混合军团。黄永年先生曾否定陈寅恪先生关于昭武九姓胡是安史军主力的论断，他从粟特人的商业本性出发，认为“柁羯”不可比之于商胡，不可能从万里之外来到河朔。并指出

① 《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下》，第4612页。

② 《册府元龟》卷九七〇《外臣部》“进贡第三”，第11232页。

③ 《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下》，第4739页。

④ 《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下》，第4739页。

⑤ 颇疑“大石国”乃“大食国”之讹。

⑥ 第一类是可汗亲兵“附离”；第二类“控弦之士”是突厥军队的主体，主要由“附属部落的辅助兵员构成”。参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113页。

⑦ 〔唐〕杜环著；张一纯笺注《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2000年，第40页。

⑧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回鹘下》，第4669、4670页。葛逻禄本系突厥一支，其下分“谋落”、“炽俟”和“踏实力”三部落。唐时居北庭西北、金山之阳（今新疆准噶尔盆地）。天宝中（742~756年），它助回鹘争强，徙西突厥故地，统治七河流域，建庭于碎叶城。

⑨ Б. Г. Гафуров, *История Таджикского Народа*, 1972г, М, стр. 264.

⑩ 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见氏著《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1页。

⑪ 张星烺《唐代西域人组成之军队考》，《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附录二第三节，第297页。

⑫ 钟焄《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⑬ 《新唐书》卷一三五《封常清传》，第3601页。

⑭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〇四《封常清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209、3210页。

⑮ 《新唐书》卷一九二《张巡传》，第4260页。

其中坚力量应是奚、契丹。^① 李锦绣女士则进一步指出,安史乱军的主力实为奚、契丹、室韦、靺鞨、高丽等蕃部为主的东北城傍。^②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则认为安氏兵中有大批突厥降部的加入。^③

虽然东胡联军占了大多数,但也有不少位高权重的粟特人。除了安禄山、史思明等核心人物以外,安禄山手下还有何千年、何思德、安守忠、曹将军、曹闵之、史定方等粟特武将。安史乱后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手下,更有安都滔、康日知、康如玢、何□、安忠实、何山泉、康日琮、曹敏之、史招福9位粟特武人。^④ 另外,至德二年(757年),安庆绪遭到朔方军、回纥联军的攻击而败走河北,其属下就有归降史思明的曳落河与六州胡。^⑤ 由于受突厥文化影响较深,他们身上的蕃味明显要重于胡味,基本都是深染蕃俗的“突厥系粟特人”^⑥。

四、安禄山的积宝与募兵

魏义天曾在《粟特商人史》一书中指出,安史之乱是在突粟共生环境下产生的,它的军事—商业目的极其明确,即通过利用北中国庞大的粟特商业网来为叛乱作准备。^⑦ 以营州为例,《新唐书·宋庆礼传》记载,开元五年(746年)奚、契丹款塞来附,唐玄宗打算在柳城重新营建营州城,于是拜宋庆礼为营州都督,“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渔阳、淄青没户还旧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⑧ 可见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前,东北营州及附近已有大量商胡存在,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整座城市的商业流通才得以正常运转。在此背景下,商胡与奚、契丹也才有结合的可能。安史之乱中的营州粟特人,一部分是由六胡州所征发以备“二藩”和突厥的部队,一部分是脱离突厥或随突厥人入降中原者。^⑨ 营州作为大本营,聚集了安禄山胡蕃集团的叛军主力,后来余部在河北一带发展,一度导致河北藩镇的胡化倾向。^⑩

① 黄永年 《“羯胡”、“柘羯”、“杂种胡”考辨》,《文史》第8辑,中华书局,1978年,第39~46页。

② 李锦绣 《城傍与大唐帝国》,收入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8~235页。唐代城傍是兵士之一种,本质是一种兵牧合一制度。唐朝政府将内徙蕃族置于军镇城旁,保持其部落组织,轻税之,战时自备鞍马出行。

③ (日)宫崎市定 《读史札记六:五代军阀の系统》,收入《宫崎市定全集·中国文明》卷17,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

④ (日)森部丰著;温晋根译 《唐后期至五代的粟特武人》,《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226~227页。

⑤ 《资治通鉴》卷二二〇“唐纪三十六”,第7047页。

⑥ (日)森部丰 《后晋安万金·何氏夫妻墓志铭および何君政墓志铭》,《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16,日本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2001年,第17~52页 《唐前半期河北地裁域における非汉族の分布と安史軍の淵源の形態》,《唐代史研究》第5卷,东京:日本唐代史研究会,2002年,第22~25页 《唐末五代の代北におけるソグド系突厥と沙陀》,《东洋史研究》第62卷第4号,日本东洋研究会,2004年,第60~93页;温晋根译 《唐后期至五代的粟特武人》,《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第226~234页。

⑦ Vaissière, étienne de la,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p. 217.

⑧ 《新唐书》卷一三〇《宋庆礼传》,第3541页。

⑨ 纪宗安 《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第203页。

⑩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12~232页。

安禄山利用所筹资金来恩结胡蕃将士,即为中亚柁羯募兵制在唐帝国的具体变例,只是情况更为复杂而已。此处的“恩结”,即“多出金谐结左右为私恩”^①之义。除了用重利诱惑,安禄山还频施“柔克”功夫,以恩义打动将士之心。《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②

禄山通夷语,躬自尉抚,皆释俘囚为战士,故其下乐输死,所战无前。

为增进主属间的情谊,禄山更效仿当时习俗,豢养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

禄山于范阳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蕃人谓健儿为曳落河——引者)八千余

人为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余人,以推恩信,厚其所给,皆感恩竭诚,一以当百。^③

据研究,这些曳落河与柁羯极为相似,不但成员中都有游牧部族,勇悍轻死,而且与主人的关系尤为密切,他们与柁羯一样,都是主子的心腹、死士和私人卫队,^④通常被称作“父子兵”。

更令人慨叹的是,为了凝聚人心,安禄山甚至利用胡蕃宗教。《安禄山事迹》卷上记载:

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天,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新唐书》中作“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⑤),至暮而散。^⑥

这段材料学者通常聚焦于集资和拜袄两个方面,却忽略了突厥神巫在其中所承担的角色。本段材料描述了叛乱发动以前,安禄山利用到范阳阅宝的机会,以宝主身份^⑦组织诸胡拜天祈福的情景。文中不但有胡天祈拜,更有神巫鼓舞,实则是突粟共生环境下袄教、萨满教的融合体现。安禄山凭借自身斗战巫嗣的威名,利用对胡天(袄教)信仰和祈福、斗宝等商业胡俗的谙熟来笼络群胡。^⑧这不仅可以有效积累巨额叛资,更能以宗教神性来维系胡蕃军团的忠心和战斗力。事实证明,在叛乱过程中,安禄山牢牢控制住了中国东北的所有军队,一直到他死后很久,都有人在祭祀他。^⑨

陈寅恪先生特别注意安史前后河北藩镇“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的情形。“圣人”是唐代俗称天子的用语,虽然安史俱已称帝,其统治区内的民众以“圣人”相称无足称异,但陈先生根据《新唐书·张嘉贞传》安史乱平后范阳复乱的史实,精辟地指出“所可注意者,穆宗长庆(821~824年)初上距安史称帝时代已六七十年,河朔之地,禄山、思明犹存此尊号,中央政府官吏以不能遵循旧俗,而致变叛,则安史势力在河朔之深且久,于此可见。”^⑩先生所言安史势力的既“深且久”,如从宗教方面加以考虑的话,似乎还能作出新的解释。

①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第4853页。

②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第4857页。

③ [唐]姚汝能著;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卷上,中华书局,2006年,第82页。

④ 芮传明《“曳落河”与“柁羯”考》,《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

⑤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第4855页。

⑥ 《安禄山事迹》卷上,第83页。

⑦ 《太平广记》关于胡商斗宝的记载,可资印证本材料中确有斗宝行为。详见(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〇三《魏生条》,中华书局,1961年,第3252页。“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坐上,其余以次分列……食讫,诸胡出宝。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径寸。余胡皆起,稽首礼拜。其次以下所出者,或三或二,悉是宝。”

⑧ 参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36~37页;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234~236页;钟焄:《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⑨ Pulleyblank, E. G.,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17.

⑩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19~220页。

钟焯仔细研究了安禄山的出生传说,指出《安禄山事迹》“赤光傍照,群兽四鸣,妖星芒炽落穹庐”以及《新唐书·安禄山传》“母阿史德,为覿,居突厥中,禱于于轧荦山,虏所谓斗战神者,即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庐,野兽尽鸣。望气者言其祥”的记载,与自十六国以降北方民族君主的出生传记类同,皆可归入“感光而妊”一类的神话题材,而这类神话与北亚各族流行的以萨满教信仰为核心的“君权神授”思想关系至深。^①由此可见,安史势力在河朔地区“既深且久”的原因之一,是神权政治和宗教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史思明之被称为“圣人”,一来是他承续了安禄山嗣位的缘故;二来他以“昭武皇帝”作为谥号,^②必然会吸引当时不少昭武九姓胡的注意。吉田丰认为北京丰台所出史思明玉册中的“昭武皇帝”仅为中国皇帝的常用谥号而已,不可将其与粟特人联系起来。^③但观《隋书》和《新唐书》“西域传”可知,当时康居与昭武九姓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即使“昭武”与粟特人没有渊源关系,但既然唐俗皆言“昭武九姓”,那么史思明以之入号就有了正名继续和招徕胡人的双重意义;对于依托某政权而从中牟利的粟特人来说,自然也乐于接受。

五、粟特人之商武二级观

以上简要概述了安禄山(附史思明)综合运用商业、礼俗、宗教、政治诸多方法笼络诸胡、招募兵员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中亚本土粟特人并不支持安禄山,而是力奉李唐之正朔。唐肃宗即位以后,即请外援助平安史之乱。至德二年(757年),广平王李俶将朔方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兵发凤翔。杜诗“花门腾绝漠,拓羯渡临洮”^④反映的就是当时的情况,诗中的“拓羯”即拔汗那的石国柘羯军。^⑤乾元初年(758年)六月辛丑,吐火罗、康国遣使朝贡;秋七月,吐火罗叶护乌利多与九国首领一同来朝,助国讨贼。^⑥九国首领中,自然少不了昭武九姓诸国。

森安孝夫教授认为粟特人具有“商人与武士气质兼而有之的两面性”^⑦,通过以上论述,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事实上,粟特人是典型的商业民族,武功并非其所擅长。前面提到的突厥系粟特人,只是突粟共生环境下的特例,如移至中亚,情况就完全不同。更何况数量也不多,相对入华商胡而言,只占了极小一部分。笔者认为,只有从商业性特征入手,才能真正把握住粟特人的本质。且举二例如下:

1. 公元7世纪初,为分化突厥日盛之势,裴矩献策离间始毕可汗与宠臣史蜀胡悉之间的关系。

① 钟焯《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②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史》1991年第9期;袁进京《唐史思明玉册试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52~258页。

③ Y. Yoshida, *On the Origin of the Sogdian Surname Zhao Wu 昭武*, in JA 291. 1—2. 2003, pp. 35—67, esp. P. 60 no. 49.

④ 杜甫《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收入《全唐诗》(第四册)卷二二五,中华书局点校本,1999年,第2412页。

⑤ 岑仲勉《隋唐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0页。

⑥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169、170页。

⑦ (日)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东京:讲谈社,2007年。

当后者听闻马邑有珍宝交关的消息,“不告始毕,率其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①结果被伏兵斩于马邑。可见生活在突厥境内的史蜀胡悉,即使身染蕃俗,也丝毫未能改变其好财贪利的本色。

2. 《新唐书·回鹘传》记载,“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货殖产甚厚。”^②对于材料中假借回纥势力侨居中国、居货殖产的粟特人,陈寅恪先生曾精辟地将其比作近代假借欧美势力来华通商致富的犹太商人。^③但如何理解同为粟特贾胡,其中一支资助安、史发动叛乱,而另一支却投向平定安史之乱的回纥人一边的悖离现象呢?窃以为,从王国维有关西胡“上下二级观”的论断中,可以得到明确答案:

西域人民,以国居东西之冲,数被侵略,亦遂专心职业,不复措意政治之事,是故希腊来则臣希腊,大夏月氏来则臣大夏月氏,嚧哒来则臣嚧哒,九姓昭武来则臣九姓昭武,突厥来则臣突厥,大食来则臣大食。虽屡易其主,而人民之营其生活也如故。当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言语风俗,固有不同,而统治一级,人数较少,或武力虽优而文化较劣,狎居既久,往往与被治者相融合,故此土之言语风俗,非统治者之言语风俗,实被治者之言语风俗也。然则论西胡之事,当分别统治者与被治者二级观之,否则鲜不窒阂矣。^④

观堂先生将政治与文化分别观照,避免了史实分析的一刀切。^⑤虽未直言粟特人,但其包括在“西域人民”范围之内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受周边各大国的交相凌迫,粟特人的政治文化难以壮大,往往沦为诸国之附庸。但该环境也因此成就了粟特人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他们在中古陆路贸易中之所以能脱颖而出,独占鳌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即所谓的江山之助;而另一方面,也形成了粟特人所独有的上下二级观意识。该意识表现在政治、经济上,就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分离,对粟特人而言,政治或军事通常只是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因此就出现了例2中看似矛盾的一幕。

以上五节,从“柘羯”、“拓设”和“柘折”词义考辨入手,逐步引出与之密切相关的突粟共生环境、突厥系粟特人等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笔者探讨了柘羯募兵制中的“募”字在不同时空环境中的实现形式,尤其考察了安祿山积宝募兵的手段和方法。最后又回归到粟特人的商业本性,结合王国维的上下二级观来分析粟特人商武二元分离的意识和心理。语义问题看似极小,背后却可挖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所谓“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⑥是也。本文虽为补正魏先生旧文所作,却旨在反省自身的学术义务和责任。作为中国的史学后辈,吾侪当以提供世界学林以准确的历史知识(尤其是国史知识)为己任,躬自厚尚且无暇,又岂有余力薄责于汉语未逮的西方学者呢?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责任编辑:陈霞 责任校对:王文洲

① 《隋书》卷六七《裴矩传》,第1064页。

② 《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上》,第4656页。

③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52页。

④ 王国维《西胡考》(下),见《观堂集林》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615页。

⑤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2页。

⑥ 陈寅恪《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72页。

New Proofs for Text Construction of *The Travels of Song Yun and Hui Sheng*

Wu Jin (9)

Abstract: *The Travels of Song Yun and Hui Sheng* in *Notes on Luoyang Temples* volume 5 was composed by Yang Yanzhi with these three articles of *The Travel of Song Yun*, *The Traves of Hui Sheng* and *The Biography of Daoyao*. It is generally argued that the main part of this version of *The Travels of Song Yun and Huisheng* was *The Travel of Song Yun* and so named *The Travel of Song Yun* also. Furthermore, Yu Taishan insisted there never be a *The Travel of Hu Ssheng*. However, this paper maintained that it is not *The Travel of Song Yun* but *The Travel of Hui Sheng* that constituted the main text of *The Travels of Song Yun and Hui Sheng* through analyzing the narrative by Yang Xuanzhi himself, the narrative convention of *Notes on Luoyang Temples*, the commentary of Li Yanshou and the length differences of the text.

Key words: *The Travel of Song Yun*, *The Travel of Hui Sheng*, *Notes on Luoyang Temples*, Yang Xuanzhi

A Further Study on the Sogdian Che – Chieh Army of China

Wang Rui (14)

Abstract: Aimed at the questions put forward in French scholar Wei Yitian's paper,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d the meanings of Zhejie (柘羯), Tuoshe (拓设) and Zhezhe (柘折) in order to draw forth questions of Turkic – Sogdian mutualistic environment and Turkic Sogdians. On this basis, the way of Mu (募) (to enlist) of Zhejie's Enlisting System in various conditions was then discussed, taking the Anlushan's comprehensive tactics of collecting finances and raising soldiers as a typical case. Finally, this paper approached the Sogdian merchants' separated dualistic psychology of commerce and military affairs by using Wang Guowei's upper – under ranks theory. To summarize, this paper arrived at a conclusion that the Zhejie in "Tong Dian: Turks" was not for Sogdian crack troops but for Arshilasheer of Eastern Turk; neither pronunciation nor meaning of the ancient name Zhezhe of Shi Kingdom in Central Asia referred to Zhejie; Zhejie in Central Asia actually meant picked soldiers enlisted by various Sogdian kingdoms mostly from nomadic Sogdians; Influenced by Turkic – Sogdian mutualistic environment, Zhejie in Tang empire was another name of Turkic Sogdian soldiers and Hu – Bo Allied army. Anlushan won commercial Hu over by means of trade, etiquette and custom, religion and politics to enlist Hu and Bo soldiers; the Nine – surname Hu's psychology of seeking huge profit while taking light of politics and mentality of separating commerce from military affairs were actually originated from the uniqu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of the Sogdian area.

Key words: Sogdians, Zhejie, mercenary system, A – Shi – Na – She – er, An – lu – shan

Possible Reason of the Site Selection of Manichaeian Monasterie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Periods of Dali and Yuanhe Reigns of the Tang Dynasty

Wang Yuanyuan (33)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Uighurs asked for the set – up of Manichaeian monasteries in China Proper respectively in the 6th year of Dali reign and the 2nd year of Yuanhe reign of the